

THE STUDY OF
MENCIU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杨颖育/著 ■



英语世界的
《孟子》研究



人民出版社

英语世界的《孟子》研究

杨颖育/著 ■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惠
装帧设计:雅思雅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语世界的《孟子》研究/杨颖育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01-013384-3

I. ①英… II. ①杨… III. ①儒家②《孟子》-研究 IV. ①B22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3117 号

英语世界的《孟子》研究

YINGYU SHIJIE DE MENGZI YANJIU

杨颖育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75

字数:350 千字

ISBN 978-7-01-013384-3 定价:5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是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重要论述。随着国际交流日渐频繁,中国经济体量的快速增长,对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成为我们增加新时期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认同与吸引力,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交流与对话的重要抓手,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意义、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从文化研究回归文学本体研究历经三十余载,我始终主张中国本土文学的独特性以及世界文学的东方视角是比较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文学的美学价值和深刻思想内涵曾经影响、正在影响、而且还将不断地影响着英语世界以及西方大众对中国的认识。回顾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华文化为世界文明奉献颇多,《孟子》以其彰显本土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引人瞩目。作为“亚圣”,孟子继承并发扬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作为儒家经典的代表作,《孟子》对中国乃至世界哲学、思想、审美方式、价值观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千百年来,《孟子》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重要的翻译对象之一,已经成为学界向西方传播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而《孟子》文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不仅是中国思想与世界文明的一种交融与对话,更是对话双方的文化增值与互补。《孟子·万章章句上》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阐释学认为,理解并非对原文的复制,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解读与阐释。文本的理解包含了作者与读者(也包括译者)的多重视域融合,这样的理解和阐释既有冲突与碰撞、也有对话与创新,这种动态文化生成观是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视角下的研究意义和价值。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

必然走向衰落以致消弭,没有东方文学的参照,西方文学的平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都是不全面的;同理,没有对儒家典籍西方传播与接受的研究,单一国内视角的《孟子》研究是不够全面的。英语世界的中国典籍研究,其魅力在于阐释的多元性和开放性,译本以及国外学者阐释交织着本土文化和异质文化的双重特征以及因由文学的他国化而产生的新的思想与视角。

杨颖育的论著《英语世界的〈孟子〉研究》,以世界文学的东方视角来考察《孟子》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研究。作者在广泛收集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从他者视角,通过对英语世界《孟子》的多个译本以及各种《孟子》研究专题著作的研究,追溯变化发展的历史语境和不同时代的学科研究范式,凸显文本接受过程中文化基因的差异性冲突与妥协,实现互为镜像式的文化对话,并提供译者、译著、中英文对照表等相关文献学资料,书后的附录和索引更是研究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英语世界发展的重要资料,其成果也将促进国内《孟子》及古代经典研究者与英语世界《孟子》研究的跨文明交流。总的来说,该论著有以下两个创新之处:首先,课题所选译本具有很强的代表性。通过对经典译本的对比研究,描写和还原了译者翻译策略选取的历史文化动因,建构译文文本生成的话语方式与不同时代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与对话,这样的视角将促进国内《孟子》及古代经典研究者与英语世界《孟子》研究的跨文明交流。其次,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通过挖掘英语世界《孟子》研究在材料取舍、术语解读、价值取向等问题意识上所呈现出来的异同,形成与国内《孟子》研究大异其趣的他者视角,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有利于我们利用西方学者在《孟子》研究上所表现的不同视角和方法,彰显儒家经典中在异域旅行中产生的差异化价值。

我相信,《英语世界的〈孟子〉研究》一书的出版,必能为我们中华文化与世界的对话带来新的思考。

曹顺庆

2014年仲春,于川大花园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第一章 西游的孟子：《孟子》西传的历时研究	15
第一节 《孟子》译本的历时性回顾	15
第二节 《孟子》英译与传播的历史分期	19
第三节 《孟子》英译的国外译本与论文研究	20
第二章 忠实与叛逆：《孟子》英译的译介学研究	31
第一节 理雅各英译《孟子》研究	31
一、理雅各其人	32
二、理雅各英译《孟子》的特点	36
三、批评与反思	46
第二节 刘殿爵英译《孟子》研究	52
一、刘殿爵的生平	52
二、刘殿爵英译中国典籍研究及其影响	53

三、刘殿爵英译《孟子》研究	55
四、刘殿爵英译《孟子》所做的贡献	61
第三节 赵甄陶英译《孟子》研究	63
一、生平、学术研究	63
二、赵甄陶英译中国典籍《孟子》及其影响	64
三、赵甄陶英译《孟子》研究	66
 第三章 想象与变形：《孟子》英译的文化翻译学研究	69
第一节 《孟子》中儒家术语英译研究	69
一、“性善论”	69
二、“仁政”学说	79
三、“知言养气”	85
第二节 《孟子》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	104
一、文化负载词定义	104
二、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的历时性分期	106
三、《孟子》中的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111
 第四章 译经与意境：《孟子》的文学翻译学研究	133
第一节 《孟子》辩辞英译研究	133
一、孟子论辩艺术的主要特点	134
二、《孟子》辩辞英译转换研究	142
第二节 《孟子》取譬设喻修辞英译研究	160
一、《孟子》比喻的特点	162
二、《孟子》比喻英译研究	172
第三节 《孟子》的文学风格英译研究	202
一、《孟子》的散文风格	202

二、《孟子》的散文风格翻译·····	211
第五章 自我与他者：《孟子》英译与西方学者的孟学研究·····	243
第一节 瑞恰兹及其《孟子论心——多重定义的试验》·····	243
一、瑞恰兹其人·····	243
二、I.A. 瑞恰兹与《孟子论心——多重定义的试验》·····	244
三、瑞恰兹对《孟子》的主要发现·····	249
第二节 安乐哲《孟子》英译与儒家文化的价值重现·····	261
一、安乐哲其人·····	261
二、安乐哲解读儒家典籍的哲学进路·····	263
三、安乐哲的典籍翻译与《孟子》研究·····	266
第三节 杜维明儒家思想及《孟子》生态伦理探析·····	273
一、杜维明其人·····	273
二、杜维明与波士顿儒学·····	274
三、杜维明对《孟子》研究的贡献·····	275
四、杜维明对《孟子》生态伦理思想的探析·····	280
结 语·····	288
附 录 英语世界《孟子》及儒家思想研究的主要 学者与汉学家·····	299
参考文献·····	315
索 引·····	337
后 记·····	350

绪 论

孟子(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并称为“孔孟”。《孟子》七篇,义深辞畅,分为二百六十章(一说二百六十一章),约三万五千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汉初以来即为学者所传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伦理道德、教育等各方面,但事实上,“各代对于孟子的观感并不相同。”^①虽然赵岐注《孟子》在汉代已经完成,非官方的说法已尊孟子为“亚圣”,但《孟子》始终未能提升到经书的地位,唐代韩愈强调孟子的地位,宋代二程将《孟子》归入《四书》之内,是尊孟的真正功臣。以后朱子遍注四书,由元代开始,至清末成为科举考试的基础,孟子的地位更不容动摇,一直被尊为儒家正统,孔孟并称乃成为大家不再怀疑的共识。孟子携其弟子作《孟子》七篇,为我们留下了他毕生追求的治国谋略、道德标准及社会伦理思想等,对中国历代社会影响深远。对于《孟子》一书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和接受,研究的人却并不多。选择“英语世界的《孟子》研究”作为本书的研究课题,主要有四方面原因:首先,选题新。通过长期查找并考察英语世界的《孟子》研究,笔者发现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孟子》英译的研究大都停留在某一方面,尚未有学者对这一课题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对《孟子》的所有英译本以及《孟子》的思想对西方世界的影响进行体系完整、脉络分明的研究。其次,资料价值。笔者在搜集关于研究《孟子》的资料中发现,《孟子》在学界占据的资料份额很多,为本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一手参考文献。据查证,国外出版的《孟子》英译本共有14本,国内学者翻译的译本共有十余种(不含同一译者的不同版本),尚未有学者对此进行文献的爬梳和总结,除此以外,多达2000多篇的关于《孟子》的相关英文评论也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多元视角。再次,典籍英译研究的迫切性。经

① 刘述先:《论黄宗羲对于孟子的理解》,《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2—3页。

济全球化冲击并影响着各国文化的消长、开放与融合。其中突出的表现是,富国文化向全球的倾泻。国家的发展与强大不仅仅依靠经济实力,文化软实力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国家软实力之一的语言,它的成功地位取决于使用者的成功作为,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典籍英译作为文化和文明的最佳载体之一,其译本的选择、翻译过程中各种翻译策略的应用,源语国、目的语国文化对译作的操控与改写,译本在他国旅行中发生的文化过滤、文化接受及变异等命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不论是考察《孟子》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哲学经典和文学瑰宝,在英语世界的流变和影响,还是以其旅行的轨迹反观自身传统文化的价值以及反思典籍英译的得与失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都有助于中国软实力的提高,也为国内孟子研究提供了多元化交流平台。最后,本书对中国传统经典文化、典籍英译以及典籍传播与变异现象进行交叉综合研究,从而探索中西比较领域中国传统经典在异质文化境遇中的传播、阐释及影响,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及发展进行描述性研究。

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代表,《孟子》在宋代被列为中国古代经典文献“四书”之一,从元代开始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考书目^①,被尊为儒家正统。对中国历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该书被译成拉丁文(1594年)、俄语(1771年)、法语(1824年)、英语(1828年)、德语(1914年)、芬兰语等西方语言以及日语和韩语等亚洲语言,其影响也远播世界各国,不仅对亚洲各国儒家文化的兴起有重要的影响,更对西方各国的哲学、人文、道德、社会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英语世界的影响也至今不衰。2009年7月2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出席中美首轮战略与经济合作对话开幕式的致辞中,饶有兴趣地引用《孟子·尽心章句下》的“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②来为中美关系做注解,比喻美、中两国的任务就是“要为后代共同探索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即便在双方发生分歧的时候,也不要让这条道路被荒草埋没”。奥巴马解释说,美中两国的任务就是要为后代共同探索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以防止彼此之间出现互不信任的情况。让人们感受两国合作决心的同时,也领会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魅力。奥巴马总统

① 刘述先:《论黄宗羲对于孟子的理解》,《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2页。

② (清)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82页。

引文出自《孟子·尽心章句下》，英文原文则出自1970年企鹅出版社推出的《孟子》的英译本，译者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殿爵，由此可见《孟子》在英语世界至今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与《孟子》一书深远的影响相比，关于《孟子》如何通过译介影响英语世界，英语世界又是如何接受和传播《孟子》的研究却非常缺乏。根据笔者在中国知网的搜索，1979年到2013年的三十多年里，论述《孟子》英译的期刊文章只有十余篇，专论《孟子》英译的硕士论文十一篇，博士论文一篇。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雅各英译《孟子》，偶有提及刘殿爵和赵甄陶等人的译本，其目的主要是为论证理译作参照，没有学者对理译以外、多达十几位的其他英译者和英译本进行深入系统的综合研究。国内现有针对《孟子》英译的研究，主要也停留在对其译文做传统的语言学、语义学层面的探讨，关于译文表象下，译者策略采纳的政治、文化动因，译文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变形、错位、变异等多方面因素却鲜有研究，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尚有多个空白点值得关注。笔者对现有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作具体介绍，以管窥目前国内《孟子》英译研究的现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杨正典^①的《英文版〈四书〉译误浅析》，是目前查证的最早一篇涉及《孟子》英译的论文，该文以1898年香港出版（1914年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修订版）的《中西四书》为例，列举了“囿于传统旧说以及对古汉语结构、词性的误解”而出现在英文版《中西四书》中的错误，全文列举误译九处，第一例便出自《孟子·滕文公上》：“……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作者认为由于句读失误，把问号放在句尾，不符合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原意。应读作“舜，何人也？予，何人也？”^②

秦颖的《英译〈中国经典〉》是一篇为湖南出版社1992年出版《汉英四书》写的书评，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硕士秦颖是该社的编辑，文章篇幅较短，分析了理雅各英译《中国经典》的艰辛和理氏的成就，作者认为，“理雅各的译风是学者化的，用六字概括即：冗长、呆板、如实”。作者举了理译《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章句下》）依字直译令人费解的例子以及《诗经》英译的一个例子，说明理氏“翻译之目

① 杨正典：《英文版〈四书〉译误浅析》，《孔子研究》1992年第3期，第101—102页。

② 对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断句，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2页。

的素为忠于原作,而非崇尚文采。”^①

楚至大的《难能可贵与美中不足——评理雅各两段〈孟子〉的译文》,作者认为,“《四书》前后有多种英译本,而理雅各的译本,至今仍被公认为最好的……毕竟有许多不利的因素,故译文仍存在若干问题,一是对原文的理解尚欠深入,只停留在原文的表层结构上,因而译文太直,使外国读者无法充分理解原文的真谛。二是对中国的风土人情尤其是中国古代的风土人情不够了解,缺乏背景知识,致使译文有误。”作者举出理雅各两段《孟子》译文“子欲子之王之善与?”(《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和“揠苗助长”(《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为例,指出理译欠妥之处,提出了作者的译法,这篇文章主要局限于个别字、句的讨论,广度及深度上有所欠缺。作者认为,“英译《四书》《五经》的工作最好能由中国学者有组织有计划地完成。这一巨大的工作既要由一个权威机构出面组织领导,也要有大批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其事。”^②199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大中华文库”系列中即有赵甄陶等英译的《孟子》,楚至大为其写了前言。

香港中文大学洪涛在《聊城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孟子〉英译所涉及的字义问题和文化问题》,该文集中研讨理雅各和刘殿爵的英译本,旁及其他译本,如W.A.C.H.Dobson, David Hinton, James R. Ware, 何祚康、赵甄陶、张文庭、周定之等的译本,文章主要探讨孟子中“仁”、“义”、“仁义”、“孝”、“道”、“气”、“博弈”等字义的译法进行比较,还对文化差异,主要是历史人物,如尧、舜、文、武、幽、厉等帝王的译法提出应加注或者表示出king,该文结论是“要翻译《孟子》,首先必须先了解《孟子》的字义(尤其是《孟子》学说的核心概念),另一方面,也应该对《孟子》书中的文化词语(cultural-specific terms)有所认识。涉及《孟子》书中一些具有独特文化背景的事物,译者面对的不只是‘词汇空缺’的问题,更要考虑文化隔阂的问题、英语读者理解能力的问题。为免曲解原意,译者有时只能用注释加以补充说明,甚至只能用拼音文字。”^③这篇论文集中讨论了《孟子》学说的核心概念的字义

① 秦颖:英译《中国经典》,《读书》1995年第1期,第76—78页。

② 楚至大:《难能可贵与美中不足——评理雅各两段〈孟子〉的译文》,《中国翻译》1995年第6期,第26—28页。

③ 洪涛:《〈孟子〉英译所涉及的字义问题和文化问题》,《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123—125页。

表达,非常有必要,也很有学术价值。厘清这些概念的字义对正确理解和翻译孟子,正确传播孟子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该文提及《孟子》英译的其他版本和参考文献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信息。

洪涛另一篇论文《〈孟子〉辩辞的英译》,对理雅各和刘殿爵《孟子》译文进行比较,首先“讨论了偶句、排句翻译与译文中的省略,重点在句式处理、表达上进行研究”。作者认为理译《孟子》对一些修辞句式进行了改写及省略。例如,对排比句、对偶句进行了适当的省略翻译。造成这种翻译产生的原因是中、英文在组成词组时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汉字是单音节字,便于组成词组,形成句与句的对仗。英语不具备这个条件,平行句式出现的频率较低。文章还从语言的意合现象与译文中的增饰分析了理译《孟子》时增饰逻辑性副词、连词等,使译文在形式上符合英文习惯,得以形合。最后讨论了取譬设喻的翻译。作者“从句式、意合形合现象和譬喻三方面探讨孟子的辩辞的效果,检讨了译者做法及其得失”。结论是“要翻译《孟子》的辩辞,形式上的仿拟是有可能做得到的,而且也不难做到,但是,亦步亦趋的做法并不是最好的做法。译者的实践,说明做汉英翻译有时也要迁就英语的习惯”。此外,在理雅各对《孟子》原文替喻的处理上,文章认为“理译过于直白,不够传神,但是意义恰当。”^①整篇文章以理雅各和刘殿爵的译文为主要评论对象,《孟子》的辩辞研究是《孟子》作品文学性的重要体现,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够深入。

陈琳琳的《析论理雅各对〈孟子〉中些许成语典故的翻译》,主要针对理雅各对《孟子》中某些成语典故翻译的不当,做了评价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论文认为:文化差异是造成译文失真的根本原因,理雅各翻译的缺憾之处,“大多是由于他对那些成语典故本身理解不透乃至理解错误造成的,……除去少数一些误译与翻译不恰当之外,其译作还是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另外他的译作严谨,忠实原文,并附有大量注释,信息量足,研究价值高,非常值得译者学习。”^②这篇论文指出了理译的“察秋毫”、“自作孽,不可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① 洪涛:《〈孟子〉辩辞的英译》,《聊城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42—44页。

② 陈琳琳:《析论理雅各对〈孟子〉中些许成语典故的翻译》,《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65—67页。

“杀越人于货”、“四体不言而喻”、“绸缪牖户”等七处成语典故的不当翻译,分析了其原因,并提供了作者自己的翻译,总体来说,这些改译的地方还是有其合理性的。

谢志超《超验主义〈日晷〉英译研究的补注》考证和校订了前人对《日晷》中英译《四书》的译文及其研究的一些差误,并做了若干补注,其中涉及《孟子》英译若干例。“1843年,爱默生与梭罗在超验主义喉舌杂志《日晷》开辟专栏介绍世界上主要的文化经典,其中摘录了科利^①翻译的《中国古典著作〈四书〉》,其中有些差误”。中国学者钱满素先生的专著《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和陈长房先生论文集《梭罗与中国》对照和整理了《日晷》上摘录的《四书》语录,不过,编录时出现了把《论语》和《孟子》中语句摘录混淆的问题,如“*When man says, I know well how to draw up an army, I am skilled in fighting, he is a great criminal*”出自《孟子·尽心下》:“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钱在《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中译为“故善战者服上刑”,变成出自《孟子·离娄下》了。陈在《梭罗与中国》中,“*When Tsze Loo heard anything that he had not yet fully practiced, he was afraid of hearing anything else.*”出自《论语·公冶长》:“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闻。”陈的汉译为“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将其错归为《孟子·公孙丑上》,等等。主要是从英文回译时发生的错误。作者认为马什曼、科利的翻译充满了他们的主观意愿。尤其是科利,“以‘福音’为唯一并排他的立场和观念上,对《四书》的翻译充满着傲慢无礼、蔑视的态度。特别是在《四书》的注释部分,科利甚至带着宗教上的偏见。”^② 作者认为早期的中国古籍西译,由于种种原因,对其考辨研究和准确求解并非易事。这篇文章主要从考据的角度补注了前人回译的疏漏之处,没有具体谈论《孟子》英译的其他方面。

任伟在《重庆科技学院学报》上发表《大中华文库版〈孟子〉文本外注释研究》,从注释概念厘定出发,研究大中华文库版《孟子》在文本外注释(包括总序、前言部分)存在的问题,重点围绕“语言问题如时态语态、非语

^① 科利(David Collie, ?—1828),多译作柯大卫或高大卫,是第一个将《四书》译为英语的人,英华书院第三任校长。

^② 参见谢志超:《超验主义〈日晷〉英译〈四书〉研究的补注》,《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2期,第153页。

言即态度问题打印错误、回译的错误,如 I. A. Richards 的 *Mencius on the Mind: Experiments in Multiple Definition* (《孟子论心多重意义探索》),被回译为 *Exploration of the Multi-meaning of 'Mind' Expounded by Mencius*; Kwong Loi Shun 的 *Virtue, Mind and Morality: a Study in Mercian Ethics* (《心性与道德: 孟子的伦理学》) 被回译为 *Disposition and Morality: Mencius' Ethics*; E. Faber 的 *The Mind of Mencius or Political Economy Founded upon Moral Philosophy: a Systematic Digest of the Doctrines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er Mencius, B.C. 325* (《孟子学说类编》) 被回译为 *Different Schools of Mercian Doctrine* 以及引用欠严谨规范等问题展开说明。”作者指出赞助人在大中华文库翻译出版中所起的作用实为双刃剑。强大的赞助人虽然让文库取得阶段性成绩,但也掩盖了背后存在的问题。^①

吴志刚《准确理解原作是典籍英译的关键——理雅各英译〈孟子〉指瑕》,主要探讨了理译的“察秋毫”、“自作孽,不可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杀越人于货”、“四体不言而喻”五处误译,分析了其产生原因,并与赵甄陶等英译《孟子》版本进行了对照,指出其各自优劣,有两处还提供了作者自己的翻译,作者认为新译本的推出可采用“权威中文译本+知名英语专家+外籍专家审读”的模式,这样的英译本既忠实于原作,又考虑到西方读者的阅读接受心理,是有质量保证的。^②

季红琴在《〈孟子〉及其英译》中首先对各家的《孟子》进行了综述,然后对 18—19 世纪的《孟子》英译进行梳理。“首先从西汉至现代对《孟子》注疏进行了集中阐述;之后从历时的角度,对几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孟子》英译的情况和各时期比较有影响的《孟子》英译本进行总结并有简短点评。表明任何关于《孟子》的一度翻译和二度翻译都不是绝对标准,对孟子的理解、翻译、研究是一个长期工程。”^③

季红琴在另一篇文章《〈孟子〉英译方法解读——全译与变译》中将《孟子》译本分为全译本和变译本。其中,理雅各的译本被誉为全译本的

① 任伟:《大中华文库版〈孟子〉文本外注释研究》,《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8 年第 7 期,第 139—140 页。

② 吴志刚:《准确理解原作是典籍英译的关键——理雅各英译〈孟子〉指瑕》,《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 年第 5 期,第 147—148 页。

③ 季红琴:《〈孟子〉及其英译》,《外语学刊》2011 年第 1 期,第 113—116 页。

经典,理译以传教士的使命为出发点,追求全面而忠实的转换;多布森的译本则被认为是变译本的典范,其以读者为导向,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攫取精华,合理变化。二位译者却为什么选择了不同的翻译方法?文中对两位译者之所以选择如此不同的翻译方法给出了解释,原因有三,首先是理雅各的身份是传教士,多布森是教师,译者基于自己的身份的不同选择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其次是“全”与“精”的追求,理雅各注重汉文化的传统意念与领悟,所以追求“全”,而多布森关注的是合理取舍,力求译文逻辑更紧密,所以追求“精”;再者是对“转”与“变”的追求,理雅各在翻译过程中从宏观上完全遵照了原文结构和布局,而多布森的重心是摄取精髓,为我所用,因此求“变”。不管采用何种翻译方法,都是在追求“相似性”和“可接受性”之间的最佳融入点,故而理本和多本都为翻译方法的选择提供了良好的典范。^①

刘单平、曾振宇在《他者视域下的儒家经典〈孟子〉英译本比较研究》中提道,“通过对理雅各、赖发洛、刘殿爵和赵甄陶等主译的四个英译本《孟子》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由于受语言因素、理解的历史性、目的语读者(target reader)、翻译动机以及翻译策略的影响,译者在语义选择、对传统习俗的敏感度和对孟子思想的理解上存在较大差异,使译本呈现各自不同的特色,主要表现在:理译本的显著特色是注释包罗万象,篇幅甚至超过译文本身;赖译本选用简单、通俗的词语逐字直译《孟子》;刘译本在许多地方都对先前的译文作了改进和创新;赵译本的特色在于今译、英译相互参照,译本通俗易懂。作者在文章中指出虽然语言因素是影响译者理解原文的首要因素,但译本的多样化是客观存在的,‘原样理解’永远是跨文化研究追求的目标”。^②

姜新在《走向欧洲的孟子——译介〈孟子〉的西文图书述略》中谈及从16世纪至19世纪《孟子》及其著作多次被翻译的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认为《孟子》是最早翻译到欧洲的中国典籍之一,主要是作为儒家的次要代表即亚圣和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译介的。因此,不但篇幅、种类不

① 季红琴:《〈孟子〉英译方法解读——全译与变译》,《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139—141页。

② 刘单平、曾振宇:《他者视域下的儒家经典〈孟子〉英译本比较研究》,《孔子研究》2011年第4期,第121—126页。

多,而且单独成书的也较少,传教士和早期旧教耶稣会士译者是翻译主体,后有新教传教士加入,同时也得到了中国人的协助。翻译过程中文化差异的碰撞在所难免,文中谈到《孟子》译介过程,争议较为突出的是关于“性向善”和“性本善”的讨论,该译本反映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在语种上也经历了从单一拉丁文到兼用不同语言的变化,图书刊行经历了由无法刊行到版本众多的变化。文中尤其谈到理雅各与卫礼贤译介中国经典的工程十分宏大。所有这些都表明欧洲社会对孟子的认识正在加深,也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欧洲逐步扩大。^①

其他的相关文章还有深圳大学王辉、福建师范大学岳峰等学者发表的理雅各研究系列论文或专著,对理雅各英译儒经做了客观翔实的介绍,如王辉《理雅各与〈中国经典〉》^②等系列论文、岳峰(2004)《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③等,这些研究主要针对理雅各的翻译思想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贡献加以评价,文中多以《论语》为例,分析其学者型翻译的特色与得失,没有针对《孟子》英译进行研究。

最早的一篇有关《孟子》英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2001年华中师范大学余敏的《从理雅各英译〈孟子〉看散文风格的传译》,该文首先介绍关于文学风格可译性的两种不同观点:“文学风格可译,以亚历山大·泰特勒、尤金·奈达及刘重德为代表;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存在差异,文学风格是不可译的。”作者认为,如果将散文风格看作一个整体,其风格是可译的,但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散文风格可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英汉语言之间有着相似性,这从语音、词汇、句法三个层面得到了论述;此外,英汉两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又使得散文风格的传译受到一定的局限。因此,散文风格的可译性是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论文以刘重德的翻译原则“切”为依据,以理雅各英译《孟子》为例,将原文与译文进行系统、全面的对比分析论证。介绍了作者选择“切”作为风格传译原则的原因是:“切”具有客观性和实用性。《孟子》的风格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句法三个层面。理雅各都进行了很好的传译。然而,由于英汉语言在以上三个层次都存在差异,

① 姜新:《走向欧洲的孟子——译介〈孟子〉的西文图书述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55—60页。

② 王辉:《理雅各与〈中国经典〉》,《中国翻译》2003年第2期,第37—40页。

③ 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